

1601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十辑

48/200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巩义市委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1991年12月

目 录

建国后史料

- 艰苦奋斗 联系群众 张存尧 崔雪楼(1)
- 甜蜜的回忆 王志明(6)
- 五十年代干部作风 焦庭才(11)
- 回忆建国初期的教师们 张世英(16)
- 回忆建国初期党的好作风 杨西景(29)
- 巩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 孟昭英 赵十一(32)
- 解放初期镇压恶霸 杨西景(53)
- 巩、成(皋)、温三县划界会议 牛先宾(57)
- 记墓坡和登封的一次土地纠纷 牛先宾(63)

海外来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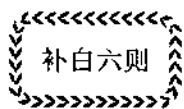
- 还乡记 姚天平(66)

巩义人物

- 辛亥革命人物——任镜海自传 省《文史资料》(89)
- 爱国将领庞国钧 李 江(97)
- 爱国将领张克修 李 江(99)

E485/15

驰名中医吴旋乾.....	李 江(102)
著名黑头演员费永聚.....	李 江(105)
《巩县文史资料》目录索引.....	(107)



善战者省敌.....	东方亮(5)
黄河名称溯源	袁振国(56)
唐代的“进士团”	傅璇琮(62)
刻削之道	徐 雷(96)
郭嵩焘的洋务观.....	钟叔河(101)
实爰与假借.....	李庸之(104)

艰苦奋斗 联系群众

——回忆巩县五十年代干部作风

张存尧 崔雪楼

我于一九五零年春到巩县，五九年初冬离开，历时将近十年。而且这十年都在县委、县政府工作。在巩县工作这么长时间，感受很多，主要感受之一，即是五十年代巩县干部作风好，特别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特点尤为突出，事例更多。现将与崔雪楼同志共同回忆的若干片断叙述如下。

一、领导深入基层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县委工作。当时县里工作人员很少，全机关仅有十余人。领导仅有：县委书记苑春芳同志，组织部长刘雪山同志，没有专职副书记（曹干军同志是副书记兼县长，主管县政府工作），也没有宣传部长。尽管如此，雪山同志还用较多时间下乡蹲点，春芳同志也不断下乡检查指导工作。县委机关经常就是留下秘书（等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等数人，听取各区汇报，处理日常工作。

二、“三同”认真

不管领导与一般干部，下乡都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吃的是一锅饭，晚上睡的是一个屋。有的“三同”户没有被子，工作员就把自己带的被子拿出来共同盖。个别干部有时到饭铺吃碗面条，也要受到同志们的指责和批评，说这是“特

殊”、“脱离贫雇农”。劳动不是做个样子，而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实实在在地干。帮助群众担水、推磨、拉煤、担茅粪、干田间活等。女同志还帮助群众纺花、织布、做些家务。通过“三同”，确实与群众建立了感情，了解到群众的呼声、要求、困难和意见，从而密切了干群关系。

三、工作抓得紧，不怕苦，不怕累

那时县、区（比现在的乡所辖范围大）干部工作，不分白天和黑夜，不过星期日。黑夜办公，绝不是偶然现象，可以说天天如此，正常情况。作息时间表上就写着黑夜办公。有的单位或个人，如晚上不办公，就要被人指责为“工作松懈”，甚至受到领导的批评。各区委召开乡党支部书记、乡长和驻乡干部会议，往往是一早报到，当晚回去。乡村离区近者三、五里，远者三、四十里，而且都是步行。有时遇到刮风下雨，也是风雨无阻，按时到区，按时回村。回村后，又是往往连夜开干部会或群众大会贯彻。县、区委开会研究工作，往往研究到深夜。遇有紧急任务就通宵达旦地干。如一九五一年冬，地委专署要求巩县在七天内上交干菜数百万斤（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支援抗美援朝。任务下达后，县、区、乡都是逐级连夜开会布置，由于时间紧，任务到了村仅有三、四天时间了，现有干菜又不足，各村就把分配任务分包到户，动员群众，用红、白萝卜片在煤火上烘干，夜以继日地加班干。县、乡、村干部包村包片，不分白天黑夜地到各村各户检查督促，表扬好的，帮助差的。广大干部紧张地劳动了几昼夜，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

四、重视搞试点

凡是重大工作，县委都组织适当数量的干部搞试点，以便总结经验，培养干部，指导全面。当时县委的土改试点在小关

区的小里河村，土改复查的试点在城关区的七里铺村，互助合作试点有两个：山区的芝田区山东村，山下的城关区七里铺村，生产试点在回郭镇的滑易镇村。该生产试点我亲自参加了，记得一九五七年，该村搞五亩红薯高产试验田，采用深翻优肥新品种（华北五五三）等措施，亩产达到八千余斤，大大高出全县红薯平均亩产二、三千斤的产量，对全县生产有很大的示范及推动作用。

五、身教重于言教

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时期，干部对参加劳动放松了。县委、县政府在会议上提出要注意改正，并且还发了文件，但效果不大。这时县委书记孙天佑同志就带头下乡与农民同劳动。我也在孝义区背上箩头拾粪。我背着箩头到各村检查工作，边检查边拾粪，走到哪村拾到哪村。这事对全县干部教育很大，很多区村干部又和过去一样参加劳动了。不少干部也背起箩头拾粪了。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干部参加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

六、不搞请客送礼

五十年代的干部，根本不搞请客送礼。干部结婚，从未有收礼待客之事，只是简单地举行个结婚仪式，散发点水果糖完事。干部调动，临走之前，单位领导与其谈话，说明调动原因，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提出希望。这就是最宝贵的“礼物”，不摆酒席送行。一般干部是如此，县的负责人调动也是如此。记得从一九五〇年到五九年，十年时间，县委书记苑春芳、孟庆彦、孙天佑、张效良等，县长曹干军、杨福祥和我等先后调走，临走时，吃饭加两个菜，表示欢送之意，都没有摆酒席送行。上级机关来县指导工作，吃饭按规定办事，该吃小灶的吃小灶，该吃大伙的吃大伙。记得一九五五年，河南省省长吴芝圃、省委常

务书记杨蔚屏带领一班人，先后来巩县视察工作，吃的仍是便饭，没有喝酒设宴，没有水果招待，就是清水一杯。领导同志在吃饭前就交待：吃便饭。如要招待，就要批评，通报全省。我们就如实地按领导意见办了。省冶金厅负责同志随同苏联专家来巩县了解铝矿情况，研究铝矿开采时，县里设酒宴招待了，但标准很低。记得一九五五年前后，财政制度规定，县长每年有一千元特支费的开支，但此项费用，年年结余。

七、廉洁奉公

五十年代的干部，绝大多数廉洁奉公，不搞贪污受贿，不徇私情安排亲友工作，不占公家便宜。不少同志对写私信用公家信封、信纸也认为是公私不分行为，因而在写私信时，自觉地自己购买信封、信纸使用。从领导到一般同志执行财务制度自觉认真，制度规定不能花的钱坚决不花。五十年代中期，全县进行肃反审干。为了慎重起见，每个被审查同志的材料都得调查落实。当时抽调外出调查材料的人员可以说跑遍全国，除台湾外，各省市都去了。凡出去的同志均没有发现借机以公款游山玩水，参观文物风景的。不少人反映说：“共产党的干部，真是无私奉献，一个心眼为工作。”

八、执行“规定”自觉认真

五十年代的干部，对执行上级的各项规定，绝大多数都很自觉认真。规定不让办的就坚决不办，规定让办的就自觉办到。例如，土改和土改复查时，收缴了地主很多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毛衣毛毯、名贵药材等贵重物品，县委县政府规定：全县干部一律不准私拿私分和购买。结果全县没有发现私拿私分和购买的。又如制度规定：妇女干部生孩子，产前产后假期两个月。绝大多数女同志执行了这一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妇女干部为了不影响工作，生孩子后就托亲求友，在城市和乡村寻找奶母（实际大都找到农村），产假期满后就把孩子送到奶母家喂养，自己就上班了。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就立即下乡与农民实行“三同”了。她们说：“妇女干部不能因生孩子、奶孩子而影响工作。”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善 战 者 省 敌

郁离子曰：“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夫欲取人之国，则彼国之人皆我敌也，故善省敌者不使人我敌。汤、武之所以无敌者，以我之敌敌敌也。惟天下至仁为能以我之敌敌敌。是故敌不敌，而天下服。”

——刘基：《诚意伯文集》

〔译文〕郁离子（刘基）说：“善于作战的人减少自己的敌人，不善于作战的人增加自己的敌人。谁减少自己的敌人就兴旺发达，谁增加自己的敌人就会衰败灭亡。打算攻取别人的国家，那么，别国所有的人就都是自己的敌人，而善于减少自己的敌人者，就不会使别人与自己为敌。成汤、周武之所以不可战胜，原因就是他们能把自己的敌人转化为敌人的敌人。而只有天下最有德行的人，才能够把自己的敌人转化为敌人的敌人。因此敌人不能取胜，天下就归服了。”

（东方亮）

甜 蜜 的 回 忆

王志明

我所以用“甜蜜的回忆”作为题目，是自认为参加革命四十多年来，在巩县工作那五年成长最快，学的也多，自己满意，记忆也最深，是为自己一生打基础的一段。

1948年冬，离开敌占区信阳高中，长途跋涉返回生我养我、日夜思念、却是刚刚解放的老家——巩县。说老实话，当时思想上很矛盾，一方面在敌占区所见所闻，以及进步老师偷借给一些进步书籍的影响，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加之“毕业即失业”，南下无望，干脆回解放区去干一番事业；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造谣，加之从未接触过解放区，所以对解放事业半信半疑。

到家不久的亲眼所见，好的印象有三：一是社会秩序安定。二是政策好。我们一行30多位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进入解放区后，沿途回老家的不少，多数入了中原大学，回到巩县的5人。历时十来天，所到之处，八路军和沿途住店都热情接待，没有出现过对我们的盘问。农民安居乐业，都忙着下地干活，与敌占区人心惶惶不安、物价飞涨等截然不同。三是干部作风好。区上干部常去我们村，穿着质朴，热情待人。好的印象在我思想上逐渐萌发了参加革命工作的念头。尽管全国尚未解放，经同学引见，在芝田区参加了工作。历任小学教师、完

小校长、县委机关干部、区委副书记等职，一帆风顺，劲头十足。

64岁了，退下来5年了；儿女孙辈一群了，教过的学生有的50多岁了，老伙计们绝大多数退下来了，见到他们，说起话来，特别是议论起在巩县工作那几年，总是甜甜蜜蜜，兴高采烈。为什么？我归纳一句话：“老八路作风培养了我们，我们没有辜负巩县人民的期望。特别是这几年听到议论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有的很刺耳，说什么“共产党得了癌症，不可救药了！”，“上边也指出来了，就是解决不了，因为上行下效，法不责众。”等等。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越发怀念过去的干部作风。

巩县第二次解放，从老区调入不少老干部，迅速打开局面，建立了各级政权，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互助合作，工农业生产进展都很顺利，在整个郑州地区是先进的。为什么呢？除了路线正确、部署得当，“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作风就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作风好就会带来无穷的、意想不到的力量。老同志教给我们的首先是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当时“三同”是口头禅，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不习惯到习惯，到自觉，到引以为荣。吃的是“罐饭”，“百家饭”，玩笑话叫“查门牌”。土改前多数农民很苦，“运动”多在冬春进行。为了通过贫雇农，扎根贫雇农，了解情况又多在他们家吃饭。小米糊糊掺红薯，玉米饼是一般的，有时玉米还掺糠，能吃顿捞面条、两掺馍（玉米和麦子面）就是改善生活了。回到机关美餐一顿，最好的也不过大肉萝卜包和大锅菜。加班到半夜，一碗汤面条就吃够标准了。在南瑶湾搞土改复查，住在一户船工家，他父有病，他爱人和两个孩子，地无一垓，又逢春季，船工挣不回钱

来，没办法，就将供给制发的那点钱买点谷子磨成面，我们几口人吃，每天夜里都是大半夜开会搞运动。饿了啃点红萝卜、生红薯，第二天照样干工作。穿的是公家发的粗布衣、粗布鞋。有一次，县委机关每人一件上衣是洋布的就算是照顾了，因为区以下机关不够发没有发。下乡好几个干部住一孔窑洞，有说有笑，在县委机关和白延中、刘元善三人寝办合一。爱人偶尔去机关过夜，管理员另找房子。我在县委机关三年多，爱人只去住过一个晚上，确切地说是半个晚上。因前半夜有工作，夜里12点以后才去睡。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走路，而且总是背上背包，打背包也是老八路教的。区委书记刘景周同志鼓励我们说：“敌人说我们：不怕骑马挎洋刀，就怕工作员背背包。54年进城市工作前，不知道什么是礼拜天、节假日，最多是春节了回家住两天。我家离县城18里，常是一年回家一次，大女儿生下几个月了，爱人才抱上去七里铺（县重点）见见面。这几年，爱人常说“你知道这几个孩子是咋长大哩？”一点不错，4个孩子最小的从小学五年级起跟我上学外，其他都是老伴的功劳。工作虽很累，但心情愉快，晚饭以后就玩会儿。年轻人喜欢打篮球，当时有的开玩笑说：“县委会王志明，领了一班野蛮虫！”不错，荆润泽、杨瑞笃我们几个是够野的，老杨常是脱光脊梁弄得浑身是汗。还说“这省哩洗衣裳”。谈到待遇、级别、提拔等，认为个人不应该想，更不应该问，也没有那个闲心去问。所以进城后历次调资，组织问及过去定级多少？那年升的？只好照实说：“不知道”，“组织了解”。直到1956年也只是知道当时的级别。几次提升和调动都是组织上谈了才知道，而且绝对服从，认为个人不应该提意见。“文革”时说是奴隶主义，难道个人服从组织不应该吗？

特别值得称颂的，是老同志经常教育我们树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纪律。地委书记李福祥同志经常去巩县检查工作，亲自调查。一次他从荥阳骑马经成皋到巩县的英峪、沙鱼沟、双滩仁、七里铺调查指导工作。进七里铺村农会时，恰好我在那里，大部分同志到面上去了。我向他汇报土改分果实情况和遇到的难题，他说“情况我清楚，是不是分果实作了难？说说怎么办吧。”当时正犯愁的是没收的大件中、贵重的东西，贫雇农不急需，他们急需的又不值钱，如何体现党提出的“填坑补缺”原则呢？他指出，召开贫雇农会，充分依靠他们，办法就有了。一次在西村工作，遇到两个因下地走路问题闹的不可开交，就按照他编的顺口溜：“最大困难，宗派斗争，依靠群众，妙计无穷”。开了两次贫雇农会，虚心请教，迎刃而解。李福祥同志还编了“八步三关”顺口溜，从入村到土改完成离村全过程，都交待的一清二楚。一次区委书记刘景周同志去七里铺检查指导工作，晚上赶着写材料，睡的很晚，我俩住一孔窑，听他咳嗽的厉害，第二天我向房东要了一点温洗脸水，不料他大发脾气，训了一顿。那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的严厉批评。

老八路作风又一个表现是爱护、信任、放手使用干部。巩县青年干部成长快，包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工作生龙活虎，是与老领导充分信任、严格要求、大胆使用分不开的。我教小学不到两个月，49年2月，经过集中学习就让去当14完小校长。当时教育科长刘景周同志找我们新任的几个校长谈话时，我出于意外，立即提出我不行。他鼓励我大胆干，不要怕困难。到校一个学期，一天也不敢离开学校，参加校内外会，还担了几节课，大家的干劲很大。如孙笑嫻等几位老教师的勤奋精神，鼓励着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康钦

惠右手出了问题，用带子攀起来，左手板书照样干。当工作队员不久，就叫负责一个点的工作，真难。当时刘景周同志能及时去七里铺点上指导工作，亲自谈话介绍我第一批入团，又把他心爱的加拿大手枪给我护身。但对缺点毫不放过，除了前面那一次批评，还有两次。每每想起那些往事，我最感激的、受益最大的就是他。50年冬土改复查，我家被补划为地主，我在县委工作，心想可能影响自己入党，但没有料到，51年春经组织调查，五月就吸收我为预备党员。“士为知己者死”，我常想：领导、组织知道自己，信任自己，不努力工作谁也对不起。

离开巩县38年了，但难以忘怀是当时的党组织——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当时的老领导、老八路、苑春芳、何应禄、刘景周、郭海松等等，还有当时流传在巩县大地上的老八路作风。相信仍在老家奋战的战友和比我们年轻的同志们，一定会发扬老八路作风，把巩义市建设的更出色。

1991、10、27

五十年代的干部作风

焦庭才

我是1948年参加工作的，现已离休。无官一身轻，常与同龄人聊天，不断忆起五十年代的一切，特别是涉及干部的作风问题，无不为之赞赏、留恋。现就这方面的情况回忆如下：

一、虚心学习、力求上进

刚参加工作，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陌生的，也可说是一无所知的。为了给人民做好工作，就必须有做好工作的基础与能力。于是就倾心于学习，热心于实践。在一些老干部的精心指导下，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党的基本知识》和当时党的方针、政策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太新颖了，每字、每句都扣动我的心弦，引起了极大的学习兴趣。通过学习，我开始认识了劳动的意义、劳动人民的伟大，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劳动人民为什么要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等等。当时的学习，除少数人到干训班外，其余都在岗位上挤时间自觉学习。那时的学习风气很浓，也很自觉。每天早上集中学习一、二个小时，没有人轻易缺席或借故不参加的。1954年左右，更有较系统的理论学习，如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联共（布）党史》和哲学等，每星期二、五下午为学习时间。当时有理论教员讲课辅导，县直干部集中到大礼堂听课。那时的大礼堂没有桌椅，没有音响设备，教员站在台上讲，干部坐在地上

或砖头上听，并且还在不停地记笔记，没人交头接耳，没人谈天说地，甚至没人中途去厕所的。真可谓秩序井然，学而不倦。说起效果，我认为每个干部学到了一些理论知识，并指导着我们的.工作前进。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奇怪，为什么当时坐在光地上或砖头上二、三个小时，不觉得屁股疼而还能静心听讲呢？我想主要的是为着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务而自觉学习的原因吧！不存在什么为着文凭、资格或装饰自己的个人主义因素。

二、不辞劳苦、认真工作

当时的各项工作，我认为都是比较艰苦的。但是，每个干部都以多干为荣，完不或任务就觉得是极大的耻辱。即是说某个同志是“一心一意为工作”，并没有什么丝毫夸张。在反霸、土改中，干部一连二、三个月不下火线的比比皆是。当时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不回家换衣服而身上生虱子的不在少数。有人风趣地把虱子当作“革命虫”，意思是只有革命的艰苦才会产生此虫。

1951年，为抗美援朝的一次扩军中，我在回郭镇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土改刚结束，贫雇农首次分到土地、房屋，正想过上安然的小家庭生活；同时，大部群众心理上残存着“恐美”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要动员一个刚翻身的青年远离家园，开赴朝鲜前线对美帝国主义作战，说实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任务压身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当时的基本方针就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吃、住、劳动在有兵源的贫苦农民家里，和他们认真地搞“三同”。对家里老人唤大伯，唤大娘，青年人称兄道弟。吃饭时先给老人端，干活时不怕脏和累。在这样的生产、生活中，有机地对他们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拥军优属”政策教

育；还要结合“翻身不忘本”、“胜利果实需要我们来保卫”的实际教育。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和他们建立了“一家人”的真情厚谊，彼此不分，互相信任。在此基础上，开始鼓励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他们也意识到参军是保家卫国，家里有困难，广大群众会帮助解决。于是，他们就解除顾虑，并比较愉快地报名参军了。参军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不断到家问长问短，解决家中的具体困难。这样，党的形象和干部的作风，都在群众的心目中产生了较大而深远的影响。当时这项工作虽然有一定困难，但通过认真地工作，都还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之更加密切了。

三、生活上的低标准、工作上的高要求

解放后，干部实行一段供给制，夏季发一套粗布灰色单衣，冬季发一套同样质量的棉衣，几个月发一双当时山区群众穿的厚底、实纳帮布鞋，有人称为“踢死牛”鞋，意思是很硬、很坚实。吃得的是小米、玉子面，仅夏季吃几个月的麦子面。菜金不记得每月几角钱，只记得大多是吃生、熟萝卜丝。当时吃饭，没有餐厅，不管冬夏都是蹲在院子里吃，由于五个人一碗菜，也不便一个人端走吃。当时的吃穿就是这个样子，但没有听到有人说不满意的话，并都好象是生活的津津有味。

但是，当时的工作情况又是怎样呢？我记得每个干部在工作上首先是不讲条件，派往那里就到那里，没有人到组织上说什么“我这里不能去，我那里也不能去”的，并且是令下即走，多不回家辞别老小。那时下乡没有汽车可坐，都是背着行李步行出发的。干部调动工作，更是如此，组织上叫今天去，没有人到明天走的，也没有象今天有的是汽车接送或举行什么仪式的，甚至借调动之机而歇一段时间的。其次是一到工作岗位，

特别是到农村，就立即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村干部认真结合开展工作，如抗美援朝动员志愿兵，统购统销发动群众卖余粮，搞互助合作宣传，使农民将土地、农具入大伙等等。这几项工作都知道是与农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但是刚由封建土地制度解脱出来的农民，马上就接触到这些问题，若不经思想发动而就自觉地行动起来，则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动员参军是要“人”的，人是娘的亲骨肉；动员卖余粮，粮食是群众生活的珍宝；号召入合作社，他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怎能轻易地慷慨贡献出来呢？一句话，当时这些工作确实是有相当难度的，可是在干部忘我的、艰苦奋斗的过程中，都一一克服了。完不成任务的同志是极少数的。为什么能够如此呢？我认为当时的干部在主观上都想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一项工作不搞完，中途很少有人脱离岗位，真可谓公而忘私。我曾记得当时出现不少这样的事例：家人有病未能及时照料，待到回家时病人已经去世了。此外，对于子女，也却有不少人没给多少父母之爱，可以说那时“合格”的父母太少了，没有尽到父母义务是太多了。

四、团结奋进、廉洁奉公

解放后到50年代初期，外地来巩干部较多，并且居领导岗位，为着工作发展的需要，又在本县吸收一批青年干部。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我们亲密无间，多数叫我们为小啥，或者直呼其名。我们对他们多称老啥，喊什么“长”的较少，相处之间，老干部经常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以革命理论和一心一意为人民的道理。我们尊敬他们，他们更爱护我们，无拘无束，亲密团结。向无新老干部之分，外地与本地干部之别，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五湖四海、亲